

绪 论

近代中国的先驱思想家们为振兴中华作出了不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根据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规律，不断总结先哲们为后人留下的思想遗产，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轨迹，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

19世纪中叶，落后的东方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有着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天朝”大门以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封建大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政治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在经济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列强的侵略、剥削和掠夺，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危机，而民族矛盾的上升又促使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西方列强通过“通商口岸”向中国内地冲击，严重地危害着中国的主权，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在这“强敌”的进攻之下，传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严厉挑战。中西文化的激烈摩擦和冲突，使中国人被迫开始与高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131种第24卷，第24页。

度发达的西方文化接触，其后果是使一部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传统文化有无存在的必要失去信心，因而导致思想界出现了全盘欧化或全盘国粹的激烈论争。西方列强的入侵，也给中国带来了尖锐而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使这个古老的封建大国，处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风暴异常激烈，政治变革日趋急剧的时代。这一形势，康有为称之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在如此深重的危机面前，一些有识志士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与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开始艰难地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近百年来，他们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了建立符合近代潮流的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尽心竭力，锐意改革。

鸦片战争前后，在一些比较开明的汉族地主阶级中间产生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就是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课题，以期对社会进行改革。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明确地反映了这一愿望。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论”和洋务思潮的出现，则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在坚守传统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的同时，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以“致用”的观点的理论化与具体实践。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和付之实践的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宣传西方文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不能阻止列强和封建专制主义接连不断地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耻辱和灾难，更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但是它毕竟孕育和促使了中国近代化思想的产生。

中法战争以后，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由经济改革发展为政治改革，而比较全面地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使中国近代化的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14 页。

则在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战争的惨败是“中国睡而将醒”^①的重大关键，它引发了思想界的变革骚动。“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②；“中国维新之萌芽，自中日之战生”^③。坚持‘变法论’的代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已名存实亡，只有立即变法，才能救亡立国；“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④。他认为，日本战败清国的原因是因明治维新推行了近代化。然而，变法维新的结局揭示了“变法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它引起了有识之士对救亡图存道路和方法的重新思考。如果将视角从“变法论”转到“革命论”上，就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反清民主主义革命派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革命方式，已是拯救中国前途的唯一方策了。“革命论”一方面是面对‘西方冲击’的对应理论——恢复中华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恢复和振兴中华，是孙中山革命理论的核心，因而它以对内消灭清王朝，对外取消列强的“压境”为前提，也是他完整的革命目标的关键。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理论，以及他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运动，是在把握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展开的，由对‘器物的觉悟’升华到了‘制度的觉悟’的程度，表明了先驱思想家在探索拯救祖国命运这一时代命题上的思想的日趋成熟。思想界从‘洋务论’、‘进化论’、‘变法论’、‘国家观’、‘民权观’等到‘革命论’的鼓吹，到‘君主立宪’和‘民主

① 蔡元培：《绍兴推广学堂议》，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第1卷，上海·中华书局第113页。

③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3卷，第43页。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见《康有为政论集》第211页。

共和”的论战，导致了封建专制政权被民主共和政体取代的政治行动，这又反映了思想家们从西方的思想体系中找寻救国的理论和方法，它说明西方的思想从被迫打开的中国国门中奔涌而进，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变化的契机。“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它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之一是深刻的革命作用，尽管这完全是出自无意。这种革命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方面和知识方面。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的儒家秩序，从而使得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而且，作为一种副产品，它还反对中国的旧传统与旧制度的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①

因此，如果从纵横两方面来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话，冲击——探索——革命——发展，构成了晚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繁荣昌盛，则是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理想，是对近代中国革命的目标和近代中国人所担负之历史重任的高度概括。围绕着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和他的同事们所作的努力，为后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思维方法。

在振兴中国的潮流中，身为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也随着时代的步伐，思考着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

^① (美) 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 页。

二

然而，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康有为在变法失败以后，逐渐由维新而保皇，由保皇而反对革命了。也有本来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了，如章炳麟。而蔡元培在这动荡的时代里，始终追随进步，为祖国的近代化贡献了毕生的心力。这正是蔡元培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之所以赢得世人尊敬的原因。

蔡元培之所以被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誉为“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是因为他“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融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身，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①；他“一方面接受了固有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又吸收了 19 世纪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新思想，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炬火”^②。这些评价明确地揭示了蔡元培思想的来源和特征。研究蔡元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不能离开讨论他的近代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即时代对他思想的影响。从 19 世纪末期起，他的思想日益发展，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一直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中心。蔡元培对中国近代化事业所作的不懈努力，为后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思维方法。前人的思想结晶和奋斗经验，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遗产，在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放射着光芒。因此，不断对这些思想和经验进行研究、反思和总结，通过对构成那一群体的先驱思想家的史像的再探讨，揭示历史

① 罗家伦：《伟大与崇高》，见拙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83 页。

② 胡愈之：《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 102 页。

发展的本质和连续性，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在蔡元培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西洋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背景和因素。他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潮流中经历过严峻的考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洋文化的激烈冲击，与此相对应的是，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中，以及在中西文化摩擦和错综纠葛中所反映出来的艰难曲折的认识过程，能揭示晚清社会变迁中士大夫的情感与心态。蔡元培便是明证。他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素养，然而，正当他到达科举仕途的巅峰之时，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带来的亡国危机，震撼了这个年轻翰林的心。他在这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民族危亡之际，思索着一系列问题：晚清政权在列强的侵犯面前，是否具有以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的能力和可能性？为了这个抵抗，是否能以自身的力量开展走向近代国家的自我变革？蔡元培通过对时局的分析，回答是否定的。

蔡元培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他经历过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等列强的侵华战争；经历过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以至国民党统治的时代；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社会变革。在思想领域，面临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互摩擦、借鉴和融合。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知识分子，要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贯性并非易事。他与同时代其他先进思想家一样，不仅正视这种危机，而且从中洞察其深度和广度，所以能超越单纯的个别性问题的思考，而从整体上、本质上和内在联系上思考问题，并力求找出解决的方法。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蔡元培深感中国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旧学的弊端，因此，他毅然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一方面，他从西方文化的本源入手，把握其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又从中探寻救国的新知，以实现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之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批

判社会的精神，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以及对旧传统所具有的挑战精神，在蔡元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些精神和意识，当来自于他一贯坚持的“兼容并包”思想和性格。

“兼容并包”一语，原是广采博收之意。《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必将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中，蔡元培的思想特色是，以民主主义的思想自由原则对“兼容并包”作了新解，并以此在这些领域里作出了贡献。因此在对蔡元培思想的意义进行反思时，不能忽略“兼容并包”的作用。他主张在学术研究上要“兼容并包”，反对专制和绝对片面性；在东西文化的冲突中主张兼容中西，反对全盘西化和全盘国粹，提倡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使之融合起来。蔡元培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具有如下的内涵：必须充分意识到现代社会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以科学的方法对待固有文化，然后，根据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进行取舍，将所取的成分融合起来，以便于去创造一种高于西方又适宜于中国国情的新文化。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理论，使传统文化有了包容域外文化的胸怀。因此可以说，他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了“传统文化与西化”、“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内在自我矛盾问题。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着如何保持传统的问题，即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中如何保持自我本色，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蔡元培的理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辨方法。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也有相似的境遇。在日本被誉为近代民主之父、明治变革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针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急剧导入西洋文明的潮流，他思虑着日本究竟“欧化”到哪一步才能依然是日本？日本如何才能继续是日本？即要改变过去，又要在不断的改变中保持自我本色，这里就有一个民族本体的自我保存问题，人们不得不肩负起内在的自我矛盾。福泽

认为,吸取西方文明时,不可不思考先后缓急的问题,以尽量适应本国民心的风俗。他提出在学习和容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从国情和民心出发,保持传统文化、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本国风俗的内容^①。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新思想的展开和发展,为繁荣思想文化,都起了重要的先导和保护作用。当它作为非政治主义的大学自治原则时,又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起到了启迪和催化作用,从而使之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空前的影响,是他遗留给后人在进行近代化、文化重建过程中的珍贵遗产,他为在中国实现近代化所作出的理性探索 and 追求精神,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

在本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蔡元培的思想依然代表着启蒙思潮的精神,每当‘开启民智’被作为社会的课题提出时,蔡元培就会被呼唤出来。因为他确实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民众的启蒙事业,因此,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与启蒙思潮相连。但是,如果只注意到他的启蒙作用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他思想的深邃性及其哲学基础的理解。他在德国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后,将中国的问题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中予以考察,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进行比较,并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从现代的新高度予以重新评价,他希望中国文化应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① 参阅〔日本〕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蔡元培的思想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看清了清王朝的腐败，毅然抛弃功名利禄，返回故乡兴办教育、培养革命人材，走上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表明了他从一个士大夫向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进步。在社会矛盾尖锐的 20 世纪初叶，他先是投身于以反对清政府为政治目的的教育活动，而后又留学德国五年，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当推翻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情绪极为高涨，积极响应，迎来了民主共和国的创立，开始了他和孙中山合作共事、用民主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的艰难历程。然而不久，袁世凯的篡权，中国再度黑暗，蔡元培不甘合污，又一次旅行欧洲，学习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他崭新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发挥了同时代知识分子所无法比拟的作用，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思想领域的历史地位。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军阀间的派系混战，使他一度与之抗争。作为国民党元老之的蔡元培，对国民党集团的专制统治和对民主势力的压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予以坚决反对，为民主自由，为保障民权，支持爱国进步事业，为追求光明而奋斗。大敌当前，主张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蔡元培思想发展的轨迹，足以反映他一生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历程，以及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向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从而鲜明地透视出了时代的烙印。

蔡元培近代化思想的核心是期望在中国实现文化和教育近代化，这个理想是在他考察和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后，又正视我国近代落伍的现实的基础上确立的。为此，他除了大力主张民主与科学，引进先进学说以外，还写了大批论著，描绘了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近代化的草图。他比其他思想家更注重思想文化的建设，注重国民性的改造。

蔡元培是孙中山革命阵营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家，他的近代化

思想中不无三民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及其以后的建设事业中，如果说孙中山是从政治和经济着眼思考振兴中华的话，那么，蔡元培则从教育和文化出发考虑中国的近代化。两人的着眼点虽有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他和孙中山一样，主张对民众进行民族主义的教育，在遭受黠武主义的侵犯面前，要勇于抵抗，在建设和发展时期，要以主人公的姿态迈向世界，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之林，立于不败之地。他注意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启迪和培养民众的独立、自尊和自强的进取精神和公民道德意识。

蔡元培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对所处的历史现实进行批判的内容本身。他投身革命，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要达到此目的，教育是重要的方法。他希望通过民主主义教育原理启迪民众，创造出新的国民，这就提出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核心课题。与此相关联的是文化近代化的问题。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清楚地反映了他要在中国创造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他毕生以媒介东西方文化为己任，认为西方文化的底蕴是民主和科学，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提倡民主和科学，酿成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线索，表现了蔡元培为中国近代化事业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他的“有容乃大”的思想境界。他的这种境界引起人们的注目，唤起人们的共鸣，人们呼吁这种精神境界应予以普及。

追求蔡元培的“有容乃大”的思想境界，是本书写作中的一个主要目的。

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本书在对蔡元培思想进行分析时，力求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出发，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将蔡元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置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背景中，重视这一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它对人们思想产生影响的关联性；第二，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课题的艰难性，揭示知识分子在解决这一课题

中所进行的探索和追求的连续性；第三，通过对知识分子在救亡事业中的努力，揭示其自身变革和不断进取精神的连续性。

本书将通过对蔡元培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思想发展和转变的深入探索，揭示在那个激烈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作为社会的一个运行机制——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借用西方思想，进行社会革命和改造“振兴中华”，为实现中国近代化所进行的追求和理性探索的历史轨迹，从而为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建立起一座比照的座标，并且也为分析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变迁提供一个十分有利的契机和有力的依据。

在世纪交替之际，担负探索建立多元世界和树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时代使命的历史学者的责任，是透过历史的表像，揭示其本质。因此，本书以蔡元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和主要研究线索，就是出于这种动机。同时，也是出于为今天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和思想上反思的愿望。

上 篇

第一章 迈向士大夫的道路

在研究蔡元培思想成因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溯他早年的足迹。

26 岁以前，蔡元培一直住在绍兴，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绍兴，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蔡元培出生在洋务运动的发端时期。1868 年 1 月 11 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夜，他诞生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城内的笔飞弄内。26 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故乡。浙江古城绍兴，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在他出生地笔飞弄附近，就有不少纪念书法家王羲之的古迹。蔡元培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就在这个文化古城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度过，传统文化的环境给蔡元培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

蔡元培的祖先自明朝由诸暨迁至山阴，他的高祖以下世代经商。祖父廷桢，又名嘉谟，字佳木，为一典当铺经理，好施于人，有“蔡善人”的美称。父亲宝煜，又名光普，字耀山，为一钱庄经理。他的父亲在世时，家境还比较宽裕。虽然在他和六叔茗珊以前，家中无人得到过“功名”，但家庭中注重读书是有风气和传统的。相传其祖父夏夜读书，为避免蚊叮虫咬，置两脚于瓮中，其“勤学可想”^①，这个方法以后也为蔡元培仿效。他的父亲为人宽厚，别人欠的帐，经常不忍心去索讨，在家庭中以“爱无差等”称之。父亲的

①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蔡元培全集》第 7 卷，第 269 页。

好友章叔翰曾有挽联称：“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①。母亲周氏，慈爱而能干。他 11 岁时，父亲耀山去世，家庭的生活发生危机，亲友中有人提议筹款作为遗孤的教育费用，周氏坚决谢辞。周氏平时常以“自立”、“不倚赖”勉励儿辈^②，父亲在世时的欠款者都主动来还所欠之款，周氏便依靠这笔钱，再卖去首饰，克勤克俭，抚养儿辈成人，对孩子的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从长辈中得知的家庭盛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想，他直到去世前都“没有忘掉”^③。

元培的母亲对他学习关怀备至。因他父亲早逝，蔡元培接受的母爱多于父爱，母亲经常陪他读书到深夜。有一次元培在晚上习作，母亲觉得夜深人倦，思路受抑，便叫他去睡觉，到黎明时再催他起来写作，元培起来后竟一气写成，从此，他就养成了终身早起而不喜熬夜的习惯。每次考试，点名总在黎明以前。他母亲半夜即起煮饭，饭熟后催他起床。“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④在待人处世方面，他母亲慎于言语，每当有事与人谈话，要先想对方将会说些什么，自己又应如何作答，事后要回忆对方说了些什么，自己又是怎样回答的，反省自己在谈话中是否有错。父母亲这些严谨的作风和诚于待人的品德，留在蔡元培幼小的心灵里，在他以后的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

元培性格自幼安祥，和易近人，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据他自述，他性格上的宽厚为父亲之遗传性；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⑤。安静和内向、勤奋和刻苦是幼年时期蔡元培在性格上的特点，并伴随了他的一生。有一些虽是细小但是很重要的例子，显示了他幼小时的安祥性格和勤学态度。事例之一是，有一次保姆带

① ③ ④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蔡元培全集》第 7 卷，第 270、273 页。

② ⑤ 《蔡元培口述传略》（上），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 249 页。

他和他的兄弟们下楼去玩，楼梯又高又陡，须由保姆抱着下楼，保姆先抱堂兄，留下元培在楼梯口坐等，不料，保姆下楼后，放下堂兄，去做别的事了，竟把元培遗忘，元培不急不躁，端坐在楼梯口，既不移动位置，也不呼唤大人，直至被家人发现。其二，一次，元培在楼上读书，住宅失火，全家惊骇不已，急唤他下楼，而元培却仍专心致志地吟诵课文。其三，他夏夜读书时，因无钱买蚊香，便将两脚放入盆中，以避蚊蚋。这件事后来成为世人传颂的佳话。

这些性格特征，强烈地反映了蔡元培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和父母自立品质的影响，“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①，长辈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他性格的形成也起了很大作用。蔡元培出生在一个和睦雍容的家庭，平时耳濡目染，为他的文化素养和性格的奠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蔡元培成年后，对儿时的学习生活仍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曾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等文章中，作过细致而生动的描述。元培 6 岁入家塾读书，接受塾师周先生的教育，父亲去世以后，家中无力再续聘塾师，12 岁时，就到家对门李申甫先生的私塾就读。开始时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三部“小书”，接着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读毕，再读《诗经》、《尚书》、《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五经。他后来在回忆当时的学习情景时曾这样说过：“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后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②当时的读书方法，是以诵读为主要的功课，先生坐着朗读，学生站在先生的旁边跟着读，然后回座位复读，直到能背诵为止，对于课文的意思则不作解释，如有背错，就责打手

① 蔡元培：《自写年谱》，见《蔡元培全集》第 7 卷，第 275 页。

② 蔡元培：《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 239 页。